

人民币背后的故事

人民币的发行已经历时61年了，当初人民币是如何设计的？为什么人民币上面的字体至今仍是一成不变？其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1947年决策发行人民币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董必武任主任，南汉宸任副主任。董必武向党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新成立的银行起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同年11月，“华北财办”确定由南汉宸负责组建筹备组，又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调来了何松亭、秦炎、王厚朴、石雷、孙及民等到“筹备组”工作。

原计划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然而战争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入北京，不能带着多种货币到北京街头买东西，必须加紧赶制全国统一货币——人民币。

毛主席一拒其像上钞票

“筹备组”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民币的设计。最初的设计，票面上设计了毛主席像，上报中央审查，中央回电不同意。毛主席指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呢？以后人民

政府成立后再说吧。”第一次没通过，又推倒重来，这一次，设计人员根据董必武指示，要求票面上要反映出解放区建设图景，重新设计了版样，顺利通过了中央审批。今天，我们翻开第一套人民币可以看到，票面上几乎都是解放区军民生产劳动的图景。

题写行名和金额的重担落在了董必武的身上。票版设计完了，紧接着就是人民币的印刷。第一批人民币的印刷是在东北佳木斯完成的，钞票纸由苏联进口，钞票印好后再运到石家庄。

毛主席再拒其像上钞票

长期以来，人民币设计者的工作和行踪都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作为人民币总体设计师，罗文柳先生的设计工作是从第二套人民币开始的。

1950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经过美术专家们认真研究，反复论证，1951年2月上报了新币的设计、印制方案。开始设计时，参考了前苏联的卢布，卢布上有列宁像，于是他们在人民币上也设计上了毛主席头像。原设计为11种面额。其中还有50元和100元两种。

后来，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取消了50元、100元券，

增加了2元券和3元券。周总理看了之后，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在钞票上印他的像和行名应改为从左至右排列的指示。

马文蔚与人民币书法

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图案活泼大方。票面上换上了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处工作的马文蔚先生题写的行名和金额。

据马老先生后来回忆：“1951年的一天，南汉宸行长从故宫博物院借来几支官廷用笔，中午休息时，南汉宸行长把我找去，让我写几个字试笔，我把笔颖捻开一看，说这笔不行，如果写字，还是用我自己的笔，我按行长要求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及五、十、元、角、分等。每个字都写了好几遍，当时不知道这些字做什么用。事后南汉宸行长找到毛主席，开始想请毛主席写，但主席说你找一个人写吧。于是南行长拿出我写的字，毛主席看后说，这几个字写得蛮好，让拿去政务院存档，字体为魏碑‘张黑女’碑体。”后来马先生所书“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通用标准字体，沿用至今。

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印制第三套人民币，原

计划从国外引进印刷设备，后因国际关系紧张，这一计划“搁浅”，在此之前，我国印钞界已获知，苏联卢布的防伪“绝招”是沙俄时代印刷专家奥洛夫发明的具有集色辊筒的一版多色凸版印刷，但当问及前苏联“老大哥”专家康诺诺夫时，没想到这位专家连连摇头：“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表示绝不外传。

后来，经过我国印钞专家的潜心研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9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平凸版多色接线印钞机”，1959年造出样机，它可以十分准确地一次完成4种颜色图案花纹的接线、间接套印和叠印，首次实现了干胶印一版多色的接线工艺技术。接着，我国又自行研制成功了更先进的“一版多色双面凸版间接印钞机”，这种神奇的机器可以同时印刷正背面的8个基本色，经叠印可以出10个以上色数，接线和正背面对印都十分准确。

这些研究成果首次运用于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加上国产水印纸研制成功及传统手工钢板雕刻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人民币的印刷技术一步跨越了20年，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水平，成为能够采用变色连续接线法印制钞票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从此彻底结束了我国依靠外国印制高质量钞票的历史。（据《大地》）

郭沫若的爱情观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女青年做伴。

南方高温多雨，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娜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娜不顾危险找到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搭船经香港回到上海。

郭沫若流亡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娜也去了。安娜凭着女性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娜的关系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患过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安娜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桑逢康）

“少帅”本是戏称

近年来，随着西安事变等题材的影视剧上演，“少帅”成了张学良独有的专称和美称。其实，“少帅”之称在民国年间并非尊称，而是一种带有蔑视或不恭意味的称呼。

清朝末年，地方督抚一般兼掌兵权，其下属便以大帅尊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沿袭清制，亦以大帅称军阀首领，官至督军可以称“帅”，到督军上者可称“大帅”。北洋时期有资格称“帅”的不在少数，对于这些“帅”的儿子，人们往往称其为“少帅”，这不过是逗小孩子玩的戏称，如果是成年人，再称“少帅”就显得有些不恭了。

据说，当年张学良的部属在公开场合只能称他的官衔，如“军团长”、“副司令”等，张作霖的几位把兄弟则称呼其表字“汉卿”，而于凤至、赵一荻都叫他“小爷”。至于“少帅”一称，在东北军里就是背后叫的也不多，除非是张学良的政敌如杨宇霆之流才敢如此称呼。（据《周末》）

梅兰芳“当官”

大约是1955年，梅兰芳忽然接到了“两院院长”的任命。第一个是中央戏曲研究院，这是个研究机构，同时也涉及各个地方剧种。第二个是中国京剧院，让自己当这个院的院长，其实也是名誉上的。

这两个院长的新职是梅兰芳没想到的，但又是不能不接受的。他挂名担任正院长，但同时又有第一副院长与诸多副院长，还有党委书记与诸多党委副书记。其中，尤其是党委书记这个职务，是解放前类似机构中所没有的。

梅兰芳很仔细，他从来是“先看再干”，如果看着可行，再干不迟。如果看着就麻烦甚多，他就敬谢着往后退了。再说这两个院，也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先说戏曲研究院，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许多人不能登台，只从古书中找资料，这么做似乎就与诸先生他们有差距了。梅兰芳能看出这一点，但不一定说出来。梅兰芳不说，别人也未必说。如果都不说，那么结局就未必合适了。再说中国京剧院，听上去名字挺“大”，但其中的人行么？一下子4个演出团，每个团挂牌的就有好几拨，时间久了就容易起矛盾。再说，这些人年轻，梅兰芳很难能跟他们唱到一块。幸亏梅剧团得以保留下来，否则梅兰芳想唱出戏都还麻烦了呢！梅兰芳想着自己与官（僚）们的关系——自己从来不是当官的材料，但跟当官的素来有接触。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呢，恐怕还得如此。能够有接触，并且彼此不反感，这就好。千万别混进人家的群里，再给你个一官半职，那就彻底糟糕了。（摘自《羊城晚报》）

胡适收藏的故事

胡适是我国最早的火花收藏家之一。他在旅居美国8年中先后共收藏5000多枚火花。

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仓促飞离，丰富的藏书和手稿、日记、书信等全部封存在他在北京的寓所内。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立下遗嘱，将留存祖国大陆的102箱藏书、信件全部捐赠北大。

其实，胡适的真正嗜好是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有一次，朋友从巴黎捎来10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胡适发现这3个字母正好与怕太太谐音，便将这些钱币转赠同好，作为怕太太协会的徽章。此外，他还总结出一个新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待，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德国文学极少有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据《齐鲁晚报》）

“猪肉粉条”劝降国民党近两个师兵力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此时，华东野战军已把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铁桶似地围在了以青龙集、陈官庄、李石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

杜聿明集团从徐州逃跑时，规定每人带7天干粮，却在陈官庄地区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了近40天，断粮断炊，于是便抢老百姓的小麦、杂豆、山芋。到后来，把拖大炮的骡子、马都杀掉了吃，最后，只得田野里挖麦苗、毛草根，扒冻坏的红薯充饥。

老天也和他们作对，1948年12月中下旬以后，北风刺骨，大雪

飞舞，天气出奇地寒冷。蒋介石虽然每天派飞机空投食品，但对于几十万大军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抢食空投的大米、馒头、饼干，国民党军打架，甚至动刀动枪自相残杀的事也不断发生。每个连队只发了14个馒头，连长、排长层层克扣，到了当兵的手中，每人只有大拇指那么一小块。

由于缺乏吃的，又大多在旷野里露营，许多士兵都冻饿而死。解放军开饭的时候，便敲着瓷碗和搪瓷盆向敌军阵地上高喊：“蒋军弟兄们，开饭了，这儿有做好的猪肉粉条，雪白的馒

头，欢迎你们来吃饭。”解放军的炊事人员少，忙不过来，就发动后方的民众帮助蒸馍，做菜。

饿极了的蒋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前来抢食饭菜，有的甚至一鼓作气跑到解放军阵地，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残酷厮杀的沙场，解放军竟给敌方送望眼欲穿的食物，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解放军送过去的是饭菜，更是真情和温暖，融化了国民党军官兵敌对情绪的坚冰，也使他们下定了不愿再打内战的决心。一次，解放军吃午饭时向国民党军阵地喊话：“对面的

邓丽君大陆行缘何未如愿

管伟华是新加坡人，邓丽君出道时的经纪人，后来和邓家交往甚密。邓丽君一生拍摄过两部电影，1969年的《谢总总经理》和第二年的《歌迷小姐》。管伟华因为前一部电影发现了邓丽君。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邓丽君的母亲谈合约。管伟华说和邓家的合约是每天100美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费用了。但到越南之后，管伟华发现，自己每月的收入达到1.5万美元。于是他再次找到邓丽君的母亲，告知实情，他把钱交给邓妈妈，让对方担自己的费用，自己只拿10%的佣金。也是那一次，管伟华赢得了邓家的信任，从此交往下来。

从那之后，邓丽君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月一万美金。在管伟华眼中，邓丽君有和大多数艺人不一样的一面。“可能是因为受过苦难，她家里没什么钱。所以她从来不争名利的。”管伟华说。之后邓丽君星途灿烂，唱片，演唱会，获奖无数，红遍东南亚各地。1973年，日本唱片公司邀请其到日发展，邓丽君的母亲找到管伟华商议。“她没念过什么书，虽然当时已经很红，只有日本可以把她包装得更好，我觉得那边3年的合约很稳定，就说

去吧。”管伟华说。这一决定成为邓丽君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之后，她推出了那首著名的《空港》，从此更加如日中天。

台湾“心理战”并非专选邓丽君

1978年左右，大陆一些爱好音乐的年轻人开始互相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伴随着音乐的流行，批判也逐渐开始。邓丽君的歌曲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从此全面被禁。从那之后，这个带有典型意识形态的词语成为了邓丽君在大陆的标签。

禁令甚至进一步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传遍大陆，虽然官方媒体从未播放过。这些歌曲传入大陆的确切源头已经无法考证。

何群（化名）在上世纪80年代是福建广播电台文艺部的书记，他回忆说：“当时广电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口头通知，不得在节目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但是没有书面文件。”何群说，他那时也听到有人说，“台湾播放邓丽君是对于大陆的心理战，要软化大陆斗志”之类的传言。“但是大家也没觉得听了她的音乐就不想解放台湾了。”

据悉，台湾也并非特意选择邓丽君通过广播对大陆进行心理战。

当年台湾中广电台的资深主持人陶晓青对记者介绍说，“台湾当时对大陆播音，没有音乐不成节目，他们也只是挑选了当时的红歌手而已，邓丽君很红，并非故意选择的”。和邓丽君同时代歌手的歌也都在电台播放。只不过因为邓的歌曲生活味道浓厚，更被大陆听众接受而已。

假护照风波与劳军演出

1979年2月18日，为简化出入境的手续，邓丽君持一份印尼护照从香港飞往日本。后这份由朋友帮助邓办理的印尼护照被怀疑为假证件。当时台湾对于假证件管理十分严格，按照法律可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时候因为假证件还有可能判死刑的。”管伟华补充说。

假护照风波后，鉴于多方考虑，持有美国签证的邓丽君决定赴美。“那个时候，邓丽君的家人都在台湾，她在美国也没什么工作可以做。她的公司也很着急。”管伟华说。

从美国的新闻中，邓丽君得知自己的歌在大陆十分流行，遂

有意到大陆观光演出。

“当时台湾知道邓丽君在大陆很火，他们知道那个时候开放了，很害怕邓丽君进（大陆）来。所以他们就做了那个劳军的演出，表现出邓丽君很爱台湾。”邓丽君答应了这个演出，管伟华说，其实这也是邓丽君的一种妥协。她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台湾因此不再追查假护照了，她也可以回台湾了。“邓丽君是个艺人，她自己不会参与政治的这些事，只不过她的家人在台湾，哥哥还是军人，都要考虑”。

1980年，邓丽君被召回台湾在“国父纪念馆”进行义唱。1981年在台湾进行劳军演出，长达一个月并制成专题片。邓丽君劳军的新闻被当局广为传播，在那个时代，她被台湾当局附加的身份已经注定与大陆无缘了。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大陆方面曾与邓丽君有过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陆演出。但是还是未能如愿。“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后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发胖，艺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状态给别人看。”管伟华说。

直到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气喘病辞世的消息突然曝出。在灵堂，管伟华亲眼看着邓丽君的棺木被盖上国民党旗。（摘自《中国新闻周刊》）